

国际文化思潮

**米德与萨摩亚人
的青春期**

**MARGARET MEAD
AND SAMOA**

德里克·弗里曼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

德里克·弗里曼 著

李传家 蔡曙光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Margaret Mead & Samoa
by Derek Freeman

根据英国企鹅出版公司1984年版译出

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经济科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本 9.5印张 227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1—2300册 定价4.55元

ISBN7-80014-792-4/C·38

国际文化系列丛书

国际文化思潮编委会

顾问:

冯友兰

贺麟

洪谦

张岱年

主编:

范进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刁炜

方鸣

王玮

王鹏令

安延明

李小兵

李河

沈大德

沈原

何光沪

吴学金

苏国勋

宋正纯

宋祖良

张晓明

单少杰

郭小平

姜兴宏

徐友渔

唐合俭

章建刚

韩水法

景天魁

谢地坤

程志民

卡尔·波普曾经证明，科学知识的进步主要在于通过有意识地采用“批判的方法消除谬误”。这也即是说，在科学领域内一切学术观点和理论都要经受系统的批驳的检验，只有它们经受住了批驳才能继续成立。波普认为科学论述既然讲的是有关现实的问题，其“真伪”就必然是可以检验的，而合理的批评就承担着检验具体论述是否与其相应的事实相符合的责任。米德的萨摩亚反例是否能够成立，显然取决于产生这一结论的萨摩亚文化是否能够充分说明这个结论。因此，本书所要讨论的基本上完全是一个科学命题，其有关的经验主义的证据应都可经受检验。

既然系统地检验一门科学的结论总是值得一试的，当有人已经对某一具体发现表示出重大怀疑时这种检验就势在必行。研究萨摩亚文化的学者们对米德1928年的发现早就提出了怀疑。我在本书中将引证详细的经验主义的证据，证明米德对于萨摩亚文化及其特质的叙述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要着重声明我并不要就萨摩亚问题提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人种论。我所要提出的证据的目的性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要证明使米德得出那种见解的依据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误，从而驳倒萨摩亚是一个反例的论点。

我的反驳将限于米德著作中那些得自或归诸于她对萨摩亚的研究的部分。我所关注的是这些实际研究的科学上的含意而不是玛格丽特·米德其人或其思想的其他方面，也不是那些与她对萨摩亚的论述无关的其他活动。此外，我还要着重说明我对玛格丽特·米德，弗朗兹·博厄斯以及其他学者们所取得的许多个人成就是非常尊重的，但对于他们的某些主张和观点我却不得不在本书中提出质问。

按照米德的说法，她对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的问题得出了那种性质的研究结果是一个历史的偶然。我写此书也是由于一个历

史的偶然。20世纪30年代后期，我在新西兰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院碰巧成了欧内斯特·比格尔厚尔(Ernest Beaglehole)的学生。他在耶鲁大学曾跟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学习人类学，而萨皮尔以前曾是弗朗兹·博厄斯的学生。比格尔厚尔的人类学观点与米德十分近似，而当我受到比格尔厚尔的鼓励决定到萨摩亚群岛去从事人种学研究的时候，所走的正是由博厄斯传下来的研究路子。当我于1940年4月到达西萨摩亚时，基本上还完全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萨摩亚人的青春期》正是比格尔厚尔全力向我推荐的参考书。所以当时我对米德的发现是深信不疑的。

经过两年的学习，我已熟悉了西萨摩亚的所有岛屿，我的萨摩亚语也已到了可以丝毫不差地按照萨摩亚礼仪同他们的族长们交谈的境地。此时，我可以选定一个当地的政治组织进行深入的了。我选的是位于乌波卢岛南岸有400居民的萨纳普村。我第一次走访萨纳普就和那里的一位年长的评议族长^①，劳维·凡努乌交上了朋友。后来当我正式到那里开始我的研究时，我得知劳维最小的儿子伐伊莫托死了。劳维很爱伐伊莫托，他把我的归来当作是对他失子的补偿。他说他要我作他的义子。从那时起，只要我在萨纳普我就是劳维家的一员。

起初，出于对米德著作的深信不疑，我曾想把一切与她的发现相反的证据都弃置不顾。但到了1942年底，我发现她对东萨摩亚马努阿村居民的许多描述，对西萨摩亚人显然都不适用。经一些在马努阿村住过的萨摩亚人向我肯定那里的人们的

① 评议族长——萨摩亚人中的贵族阶层。在萨摩亚，姓氏族长分为：象征族长、陪席族长、评议族长三个等级，象征族长地位最高。评议族长在维护象征族长的声誉、权威的同时，具有决定和执行村落事务决议的权限。

生活与西萨摩亚岛上的生活基本一样之后，我才认识到我必须把系统检验米德对萨摩亚文化的描述作为我的研究目标之一。

在我回到萨纳普村后的一天早晨，村里的族长们在劳维家里集会授予我一个具有该村族长地位的头衔，于是我便有了参加全部族长会议的权利并很快就得到了村民们的承认。从此，我便处于一种研究萨摩亚人生活的极为有利的地位。

到我于1943年11月离开萨摩亚时我已清楚地意识到我迟早要担起责任写文章批驳米德关于萨摩亚的结论。这当然需要对早期萨摩亚的历史进行大量研究。我于1945年从悉尼的米切尔图书馆收藏的手稿开始着手，随后又到伦敦彻底研究了伦敦传教士协会的全部萨摩亚档案。

在1946至1948年我在伦敦大学学习人类学期间，写了一篇论述萨摩亚社会组织的博士论文，而我心里想的却是要回到玻利尼西亚去。可是，到了那里之后，却碰到一个机会使我在婆罗洲的伊班人中生活了几年。这一插曲后来又把我引到剑桥大学去完成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习并开始从新的角度研究人类学，结果大大拖延了我对萨摩亚的继续研究。

最后，我终于在1965年底和我的妻子、女儿一同回到西萨摩亚。此时的萨纳普村已有公路和首都阿皮亚相连。它又一次成了我的研究活动的中心。萨纳普村的族长们立即承认了他们在1943年授予我的那个头衔，我于是便又成了萨纳普族长会议的活动分子。我们一家在萨摩亚住了两年多。其间，我们常到萨纳普村所在区的其它地方去访问，也从该群岛东部的萨乌厄到该岛西部的费利鲁普等许多地方去访问过。

许多受过教育的萨摩亚人，特别是那些在新西兰上过大学的人对米德有关他们的文化的著作都很熟悉。其中有些人要求我以人类学家的身分纠正米德对萨摩亚人的文化精神的错误描绘。于是，我便于1966年初着手对米德有关萨摩亚的全部著作

进行检查，通过对她那些著作中所提到的具体行为和风俗的详细调查，检验她的结论。我得到西萨摩亚首相的允准还调查了秘密法庭和警察档案，这对了解萨摩亚人，包括青少年的侵犯行为和性行为的重要情况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来源。

真巧，由古代来自塔乌岛的移民建立起来的萨纳普村正是1925至1926年米德研究活动的主要场所。这一事实正可利用，我于是在1967年，组织了一个去塔乌岛的正式旅行团。当地人民对我们这批来客简直像对待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亲热，这就使我能够同塔乌与萨纳普两地的族长们一起，对米德那些引起争议的有关萨摩亚的描写的全部细节进行审查。我还记录了塔乌的男男女女根据记忆对米德著作中所写的那个时期的证词。他们对那时的许多事情有着生动而鲜明的回忆。一位向我提供情况的人说，他们对本世纪20年代中期发生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

事情随着调查的进展而明显起来；我对米德结论的深入批判将不得不把人类学研究的范例《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也包括进去。为了理解当时促使博厄斯派米德到萨摩亚去的情况，我不仅必须调查人类学的历史而且还必须调查生物学的历史，尤其是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以来，生物学与人类学思想的相互影响。由于必须查阅有关的原始著作，我断断续续花了十多年才完成了这项调查。

在本书1—4章中，我对生物学思想史与人类学思想史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作的说明，给了解弗朗西斯·高尔顿及其追随者们的思想和研究计划在优生学运动中怎样引起人类学家和别的学者们的反击，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这个反击运动于本世纪20年代中期演变为先天论与后天论之间的激烈分歧而达到顶峰。知道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这些思想发展的情况，为了解米德的萨摩亚研究对以弗朗兹·博厄斯和阿尔弗雷德·克

鲁伯为首的美国人类学派的关键性意义也是必要的。自1917年以来，这个学派一直与极端的文化决定不可分开。因此，本书一方面主要致力于批驳米德从她的萨摩亚研究中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同时也致力于检查与绝对文化决定主义神话有关的范围更广的其它方面，为抛弃那个现在已经过时了的理论，采纳一个更科学的人类学范例执言。

直到1981年我查阅了美属萨摩亚高等法庭本世纪20年代的档案之后我的研究才告完成。因此，当本书问世时米德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好在1964年米德访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时，我曾和她的一次私下谈话中，把我不同意她对萨摩亚的看法的实际根据，毫无保留地告诉过她，而且自那以后我们还保持着通信联系。1978年8月，我写完第一稿后便写信告诉她，我要把批驳她在《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中所得出的结论的草稿本寄一份给她。她生前没有给我回音，因为她于同年11月便去世了。

1981年9月，我专程回到西萨摩亚将本书的草稿本交给萨摩亚的学者们详加批评。本书的第5至第19章便是经萨摩亚大学的勒·塔加罗·利天塔·庇塔极其认真地核对过的。我还从西萨摩亚到图图伊拉和马努阿，同那里的有识之士进行了讨论，并充分考虑了他们的意见。米德所描绘的萨摩亚文化使人产生误会，所以许多萨摩亚人都鼓励我著书加以批驳。在写书的过程中我不得不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萨摩亚生活的阴暗面。在我1981年的访问中我发现当时的萨摩亚人已成熟地认识到正视现实之必要，同时又清醒地为萨摩亚生活方式之美好与力量感到自豪。

后面的章节都是根据调查写成的。这些调查活动，因为时断时续，差不多用了40年时间，其中包括在萨摩亚的7年和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的研究图书馆中所用的不止7

年的时间。1965—1968年及1981年我在萨摩亚的工作，都是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院的太平洋学院为基地的。正是由于这个学院给我提供了这个十分难得的研究机会，我才得以对人类学和生物学的历史进行了探索，并使这项对这个20世纪的重大神话的研究取得成果。这项研究所涉及的是一些最重要的人类学问题，我希望它对解决这些问题能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作者

国际文化系列丛书

国际文化思潮编委会

顾问:

冯友兰

贺麟

洪谦

张岱年

主编:

范进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刁炜

方鸣

王玮

王鹏令

安廷明

李小兵

李河

沈大德

沈原

何光沪

吴学金

苏国勋

宋正纯

宋祖良

张晓明

单少杰

郭小平

姜兴宏

徐友渔

唐合俭

章建刚

韩水法

景天魁

谢地坤

程志民

目 录

序 言

第一篇	文化决定论的出现·····	(1)
第一章	高尔顿, 优生学与生物决定论·····	(2)
第二章	博厄斯同文化与遗传的区分·····	(16)
第三章	文化决定主义的兴起·····	(29)
第四章	博厄斯提出一个难题·····	(43)
第二篇	米德的萨摩亚研究·····	(55)
第五章	米德给了博厄斯一个绝对肯定的答案·····	(56)
第六章	米德对萨摩亚人的描绘·····	(71)
第七章	神话的形成·····	(83)
第三篇	对米德结论的反驳·····	(97)
第八章	米德进行的历史环境·····	(98)
第九章	等级·····	(113)
第十章	合作与竞争·····	(122)
第十一章	侵犯行为与战争·····	(137)
第十二章	宗教: 异教与基督教·····	(155)
第十三章	惩罚·····	(173)
第十四章	孩子的抚养·····	(182)
第十五章	萨摩亚人的性格·····	(194)
第十六章	性道德及性行为·····	(209)
第十七章	青春期·····	(239)
第十八章	萨摩亚民族的文化精神·····	(254)
第四篇	米德和博厄斯派的范例·····	(265)
第十九章	米德对萨摩亚的曲解·····	(266)

第二十章 朝着更加科学的人类学

研究的方向迈进..... (280)

附 录..... (289)

译后记..... (292)

第 一 篇

文化决定论的出现

第一章

高尔顿，优生学与生物决定论

玛格丽特·米德着手写她那最著名的著作《萨摩亚人的青春期》是在1926年的秋天。那时她刚从南太平洋归来新任了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负责人种学研究的副馆长。她于1925年受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人类学教授弗朗兹·博厄斯的授意到南太平洋去求证西波利尼西亚的萨摩亚人的青春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在多大程度上是文化因素决定的。

在1910年前后开始的关于先天—后天的争论到了20年代中期依然在热烈地进行着。1924年，斯图亚特·赖斯写道，“近几年中在社会学研究方面没有一个课题要比决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生物学因素和纯社会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所引起的歧议更多了。”一边是像H·M·帕什利那样的生物学家，他们认为儿童是“遗传倾向的严格的综合体”，另一边是T·B·沃森及其支持者，他们坚决宣称“是后天的教育而不是先天的因素”决定着“儿童成为什么样的人。”年轻的玛格丽特·米德走上的就是这样—个混乱的闹哄哄的战场。

正象米德的记录所说的当时科学界最重大的问题就是“人的本质是什么？”米德正是为了答复这个以及其它有关问题才写了《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她按照博厄斯制定的一项专业调查提纲对一个远离美国，与20年代的美国大不相同的波利尼西亚社会进行了实地考察，搜集了一些证据。她带着从这些证据中得出的研究成果投入了这场争论。她所宣布的结论认为后天

的因素完全压倒先天的因素。这当然使生物学因素决定论者感到不快而使文化因素决定论者兴高彩烈。在美国和别的地方人们长期以来都把青春期所出现的困难和不安，看作是一个自然过程的共有现象。然而，在米德看来这种不安在萨摩亚人中却根本不存在。所以她便得出结论说这表示只能从文化上解释青春期的行为。

《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书于1928年出版并附有博厄斯写的一篇表示赞赏的前言。同年晚些时候，博厄斯在他的《人类学与当代生活》一书中还特别提到米德的“在萨摩亚青春期危机消失了”这一重大发现。博厄斯不加思索就接受了米德的这一发现和她笼统地认为社会压力对“该社会中个人性格的形成起着绝对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结论有力地证实了他本人最珍爱的信念。他曾于1916年攻击过“优生学的信徒们”“宣扬”了好几年的“野心勃勃的理论。”与优生学家的观点相反，他认为“社会的刺激远比生物机制更为有效。”他的学生玛格丽特·米德在萨摩亚所证实的正是这个观点。

1916年博厄斯的主要不满是那些优生学家们把他们的“先天而非后天”的战斗口号提高到了教条的地位，结果使决定人的生死存亡及人的身心情况的环境条件反倒退居陪衬的地位。博厄斯的不满是不无道理的。例如，《遗传杂志》的编辑保罗·波普诺在1915年就曾断言（他自称有不容争辩的事实为依据）“遗传的力量在产生人的差异方面不仅远比任何单个的环境因素强大得多而且比全部环境因素加在一起还强大。”同年，伦敦大学第一位获得高尔顿奖的优生学教授卡尔·皮尔森也宣称“先天影响比后天影响大五至十倍”的断言是毫不夸张的，它为“加速种族进步”的改革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博厄斯对优生学展开全面攻击之时此类断言已非罕见，而且这些断

言都与麦迪逊·格兰特《伟大种族的消逝》一书中的种族主义观点有着直接的关系。

1907年12月博厄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讲课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将人类学的方法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分开是不可能的，他希望“利用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人体测量学和人类学的可靠方法”会有助于把“种族混合”和优生学从炽烈的政治讨论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冷静的科学调查的课题。但是，到了1916年，他的态度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因为在从1907至1916年这段时期中优生学运动已蜕化成一种伪科学的崇拜。博厄斯此时已将优生学和对历史的种族主义的阐释视为一种无可挽救的危险。他指出遗传派的极端主张已在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之间造成了分歧以至到了彼此不得不“分道扬镳”的地步。

这些话成了不祥的预兆。数月之后，博厄斯从前的两个最能干最活跃的学生艾尔弗雷德·克罗伯和罗伯特·罗伊便发表了他们经过思考的宣言，将文化人类学与生物学分家。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提出了一个把生物学因素完全排除在外的绝对的文化决定论。20世纪人类学史上的这个转折点是19世纪后半期以来整个发展过程，特别是生物学发展过程的顶点。本书第一章所以要从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叙述到1911年弗朗西斯·高尔顿去世，正是为了要把这些重大事件考虑进去。高尔顿被称作“优生学之父”。博厄斯，克罗伯和罗伊所极力反对的遗传派的极端理论主要就是他创始的。

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在他1916年7月给格兰特的《伟大种族的消逝》所写的序言中明确地把优生学和对历史的种族主义的阐释与“伟大的生物学运动”联系在一起。这个运动始自19世纪70年代弗朗西斯·高尔顿和奥古斯特·魏斯曼的学说。他们的学说讲的基本上是自然选择现象，就是《物种起